

航天人生，
 艰辛跋涉，
 绚丽多姿；
七彩人生，
 负重拼搏，
 灿烂光辉。
他们是共产党员，
 在太空建树功绩；
他们是先进代表，
 助推火箭腾飞。
在神舟飞越的星空，
 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在新的长征大道上，
 他们高擎火红的旗帜



钱学森

中国人的骄傲

他曾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一起，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树为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钱学森成为中国航天人的一面旗帜。

大火无心天外流

钱学森生于 1911 年 12 月 11 日。早年在北师大附小、附中求学期间，学习非常用功，成绩名列前茅。1929 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5 年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远涉重洋踏上科学救国之路。钱学森先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第二年就取得硕士学位，后又慕名到加州理工学院深造，师从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教授，获取博士学位后即留在冯·卡门航空大师领导的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工作。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合作关系，在喷气推进技术和空气动力学领域取得突破性成就。

钱学森站在数学和力学的最前沿，如饥似渴地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理论，刻苦攻读空气动力学和航空工程，每天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冯·卡门十分推崇钱学森这位中国学子的勤奋好学和创造才能，曾这样评价说：“他在许多数学问题上和我一起工作，我发现他非常有想像力，他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能成功地把它与准确洞察自然现象中物理图像的非凡能力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他帮我提炼了我自己的某些思想，使一些很艰深的命题变得豁然开朗。”钱学森与老师合作，共同创造了“跨声速流动相似率”、“高超声速流概念”和“冯·卡门-钱学森公式”等理论，在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

在冯·卡门教授的影响下，钱学森对新兴火箭技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参加了著名的古根海姆实验室五人火箭小组。1942 年他受美国军方委托，开办三军技术人员喷气技术训练班，讲

授和研究用火箭发动机推进导弹的课题。1943年他和热心研究火箭技术的同学马林纳合作，完成了《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几种火箭研究的设想，为美国发展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理论技术基础。1944年，钱学森在冯·卡门领导下，参加了美军“下士”导弹的设计工作。1945年，钱学森被美国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成员，参加了对德国秘密研制火箭的技术考察。他在美国已成为一位卓有建树的火箭专家。美国空军高度赞扬钱学森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无法估价的、巨大的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认为，钱学森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是“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终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

1947年，经冯·卡门推荐，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从1949年开始，他又肩负起著名的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这时钱学森已被公认为世界上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空气动力学研究的开路者、现代火箭技术的先驱者。

当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传到大洋彼岸时，钱学森兴奋极了，立即萌生了强烈的回国念头，决心为新生的祖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1950年7月，他去会见主管他研究工作的美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波尔，告诉他准备动身回国。这位海军次长大为震惊，立即通知移民局不准放行，咆哮地说：“我宁肯把他枪毙了，也不愿放他回中国，因为他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正当钱学森辞去加州理工学院超声速研究中心和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职务，全家准备搭乘飞机离开美国的时候，却突然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非法逮捕，并被限制人身自由，饱受迫害和折磨达五

年之久。为了争取早日回国，在这段时间里，钱学森有意改变科研方向，开始从事工程控制方面的研究工作，1954年写成《工程控制论》，开创了一个新的工程技术研究领域，从而确定了他在工程控制论领域创始人的地位。“这本书是给美国人看的。”钱学森并不在乎工程控制论的价值，而是想尽快摆脱美国政府的阻挠，随时能启程返回他魂牵梦萦的祖国。

1955年6月，钱学森摆脱监视，把一封写在小纸条上请求祖国帮他实现早日回国愿望的信辗转寄到了国内。周恩来总理见到这封求助信后，亲自安排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交涉，据理力争，设法营救，义正词严地戳穿了美方的谎言。经过艰苦斗争，钱学森一家终于在1955年9月17日启程回国。在向恩师冯·卡门告别时，这位空气动力学大师满怀惜别之情对他的得意门生说：“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后来，周恩来总理对要回钱学森一事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积极结果，但是，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件事情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是有价值的。”

钱学森说：“我从1935年到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作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大火无心天外流。钱学森回国自称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激动。他冲破藩篱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开始了为创建新中国航天事业的新征程。

跨箭相期天际游

钱学森回国后，周恩来总理为他的一家接风洗尘，要他先到各地看一看，熟悉一下祖国的情况，然后对国家的各项工作提出意见。党和政府要为他创造一个崭新的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

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亲眼看到祖国建设蒸蒸日上的气象和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面貌，特别是钱学森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访问，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赶回学院热烈欢迎他，并询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之后，钱学森深受鼓舞，企盼祖国更加强大，感到自己负有一份责任。1956年春，毛泽东主席设宴招待全国政协委员，热情邀请钱学森与他坐在一起，并亲切地征询他对发展火箭技术的意见，勉励他致力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培养自己的青年科技人才。在毛泽东主席“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和周恩来总理的热情鼓励下，钱学森这位饱受屈辱回到祖国怀抱不久的海外赤子异常激动，怀着对新中国发展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强烈责任感，奋笔疾书提交了一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阐述了发展中国火箭导弹工业的规划设想和具体步骤。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一次不寻常的中央军委会议上，钱学森被邀给最高军事领导人讲解我国发展导弹事业的规划和设想。同时，由他牵头完成周总理领导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中《喷气与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任务。随后，中央决定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钱学森被任命为委员，并出任1956年10月8日诞生的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在最初组建的航天队伍里，只有钱学森一人是火箭专家，他从为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投入了一个神秘而宏伟的事业。

在争取到苏联的有限援助之后，1958年钱学森协助聂荣臻元帅部署了第一枚近程导弹的仿制工作。1959年他光荣地成为伟大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更加自觉地把发展火箭导弹事业和共产主义奋斗的伟大理想结合起来，全身心地开创祖国新兴的尖端科技事业。1960年10月，在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极端

困难条件下，他带领广大科技人员和工人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在很短的时间里仿制成功第一枚近程导弹，并于 11 月 5 日一举发射成功。在基地的祝捷宴会上，聂荣臻元帅兴奋地宣布：“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科学的道路并不平坦，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痛楚。1962 年 3 月 21 日，我国自行设计和研制的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进行首飞试验，导弹起飞后不久就在距发射架 300 米的地方坠毁。尽管钱学森不是这枚导弹的总设计师，但身为导弹研制工程的总负责人，他和大家一样心情十分沉痛。然而面对人们低落的情绪，他不无风趣地对大家说：“我在美国，每写一篇重要论文，成稿没几页，可是底稿却装了满满一柜子。科学试验如果次次都能成功，那又何必试验呢？经过挫折和失败，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他鼓励大家振作精神，分析失败的原因，采取切实措施，继续再战。钱学森指导大家以更加认真细致的态度对待科研工作，并高屋建瓴地揭示型号设计师注意发动机的高频振荡和系统协调问题。他们查原因，排疑点，从总体方案设计、分系统之间技术协调，到多系统试验、总测试复查，找出了问题的症结，然后修改设计，加强了全弹试车和振动试验，获取了大量可靠的数据。1964 年 6 月 29 日，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与钱学森共同商量，决定发射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的导弹技术从仿制进入到了独立研制的新阶段。

1958 年 5 月，毛泽东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立即引起了钱学森的强烈共鸣。他即与科学家赵九章、郭永怀等一起积极倡导开展空间技术研究工作。在他的主持下，连续举办了 12 期星际航行座谈会，并作了《今天苏联及美国星

际航行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演讲。1962年又编著出版了《星际航行概论》一书，组织安排了航天的预先研究课题，为发展中国的空间事业准备条件。1965年1月，钱学森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说明鉴于我国自行研制的弹道导弹已经取得突破性成果，建议早日制定我国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付诸实施。同年5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批准研制人造地球卫星计划，并组建卫星研究院，拟定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方案。钱学森成为研制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技术总指挥、总顾问，1968年又兼任新组建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率领科技人员去攻克卫星和运载火箭的技术难关。

1966年，当发射第一颗卫星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进行滑行段喷管控制的仿真试验时，出现了晃动幅值异常现象，大家束手无策。钱学森到现场观察了整个试验过程，认真倾听了大家的意见，然后胸有成竹地做了结论：“这种情况是在近乎失重的状态下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晃动模式已不能成立。此时流体已成粉末状态，晃动力很小，不会影响火箭的正常飞行。”后来的飞行试验证明，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在“文革”的困难日子里，钱学森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全权处理运载火箭和卫星研制试验工作。1969年7月，由于“文革”派性的干扰，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试车一时无法进行。钱学森受命于危难之时，把科技人员召集在一起，严肃地宣布：“我是受周总理之命来主持火箭试车的，这是毛主席批准的任务，我们要尽快把卫星放上去，任何人都要服从于这个政治任务。如果技术上的意见分歧，欢迎大家提出来。试车要立即进行，不能再拖了。谁再拖就谁负责！”他的一席话打动了科技人员和工人，大家以大局为重，把派性扔在一边，积极投入火箭试车工作，连续四次试车取得圆满成功。

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卫星发射到了最后冲刺阶段。但在发射准备过程中不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险象环生。在周总理的直接指导和关怀下，钱学森在酒泉基地组织实施发射工作，他按照“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要求，冷静细致地处理随时发生的各种情况，坚信这支科技队伍的能力，坚信技术上的可靠准备，果断地建议：如无特殊情况，不再变动，按计划发射。4月24日长征一号火箭托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升空。当从千里之外的观测站传来“卫星入轨”的喜讯，钱学森看到多年呕心沥血结出丰硕成果，看到多年奋斗的梦想变为现实，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流下了喜悦的泪水。他回国15年，终于用自己的勤奋和智慧实现了报国的夙愿，迎来了中国航天时代新的黎明。

钱学森打开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大门。此后，他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组织管理、策划指导，站在航天技术发展的高层，统揽全局，运筹帷幄，对我国航天技术的发展规划、型号的方案论证、技术攻关、重大问题的组织协调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以后洲际弹道导弹、水下发射战略导弹、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各种人造卫星以及神舟飞船的成功发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人们不会忘记钱学森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和发展建树的伟大功绩。

西子湖畔数风流

钱学森是浙江杭州人。他自幼酷爱艺术，有广泛的爱好，尤其是迷恋音乐，少年时代便是有名的铜管乐手。当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园里，经常可以听到他吹奏圆号那悦耳的乐曲声。在受过西方音乐教育的声乐家、夫人蒋英的影响下，钱学森还熟悉各种中外名曲，熟知世界乐坛名家的各种音乐风格。他经

常轻声哼着世界名曲，脑海里思考着太空飞行的旋律。他自己说过：“我一直在提倡科学技术工作者要有文艺修养。”

钱学森不仅拥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航天的世界，而且还拥有一个艺术的世界。他钟爱美术、摄影和音乐，在这个世界里甚至包含着他的信念、智慧和爱情。他从教育家的父亲那里开启了一扇艺术之窗，在绘画、摄影和音乐的诗情画意中，不断丰富了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对世界的认识，开拓了科学研究的广阔思维。他曾不止一次地对从事古典歌剧艺术的夫人蒋英说：“你们搞艺术的人需要灵感，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来的。”

钱学森和蒋英的爱情可以说是科学与艺术的结晶。尽管有父辈世交的渊源和青梅竹马的基础，但却是在对艺术的共同爱好和追求的沃土上萌发的。蒋英深情回忆往事说：“那时候，我们都非常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学森还很喜欢美术，水彩画也画得相当出色。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不知为什么，我喜欢，他也喜欢……”除了音乐之外，他们对文学、历史、诗词、书法、篆刻、绘画以及欣赏大自然的美景，都有共同情趣和爱好。后来钱学森负笈去美国学航空工程，而蒋英则远去西欧学古典声乐，到1947年双双回到上海相逢，很快就续上了两人之间萦绕不断难以割舍的美满姻缘。

钱学森已成为享誉中外、集科学大成的科学家。除了在航天技术领域造诣很深之外，在应用力学、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领域，以及在系统工程、思维科学、科学技术系统等领域，都有重大创见和成就。他在美学、文艺学、园林学、文化学、技术美学等方面，都发表过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论文。特别是

他从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吸取美国 PERT 管理技术，运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有效地组织科技大军大会战的成功经验，总结提出了一套系统工程的管理办法，创立了系统工程科学学说。这套学说不仅使我国航天事业取得巨大成就，而且推广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形成了社会系统工程、地理系统工程、农业系统工程、军事系统工程等应用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钱学森的科学成就彪炳青史。1957年，他的专著《工程控制论》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他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称号。1985年，由于他在我国战略导弹研制方面取得的成就，获得全国科技进步特等奖。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他“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199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把他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五人树立为新中国成立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钱学森能与全国人民群众爱戴的英模齐名，他十分激动地说：“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三次激动。”

1991年10月，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199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金质奖章。在巨大的荣誉面前，这位功勋卓著、富有传奇色彩的科学家一如既往，显得十分平静、祥和，脸上总是挂着宁静的微笑。他说：“成绩归于党，归于集体。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撰稿：刘念）



任新民

一个总总师的传奇

他的一生见证了中国航天的辉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他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在他近 90 岁时,人们在神舟飞船发射现场,还能看到他的身影。

站在航天的制高点

试验通信卫星工程是我国航天事业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的重点任务之一。1975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了由任新民参与制定的发展中国通信卫星工程的报告，由此有了中国航天史上著名的代号为“331”的我国通信卫星工程，作为中国试验通信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和技术总指挥，任新民也开始了几十年的总总师的生涯。

说起“331 工程”，尽管任新民总是回避谈自己，但是翻开“331 工程”的发展历史，我们却总是发现任新民的身影，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可以说，没有任新民，就没有为通信卫星发射立下汗马功劳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而当初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上是采用常规发动机还是氢氧发动机的争论中，正是由于任新民的据理力争才最终确立了氢氧发动机的方案，并最终有了长征三号的辉煌，也由此再一次确立了任新民在中国航天界的地位。拿 20 多年后的发展载人航天时的飞船和航天飞机之争来比喻当年的这场火箭发动机方案之争也许不合适，但是，在技术争论之中，最能表现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胆识和道德风貌。从这一点上来说，任新民恰恰每次在这种时候，除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之外，都表现出一个优秀的科学工作者敢于发表、坚持和修正自己的技术见解，敢于负责、敢于对重大技术问题适时而果断决策的良好的道德风貌。他曾说过：“一个科技人员判断和处理技术问题，一是靠他的基础技术知识和实践经验；二是靠他不断深入实际，从广大科技人员、工人那里，从实践中汲

取和补充知识；三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正如他常说的那样，他的行动也一直实践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他的大半生航天生涯中，深入现场的时间占了大半。他的判断和结论从来都是来自实践。

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研制过程中，火箭第三级采用现成的技术还是世界先进水平的推进技术，在定方案的碰头会上，任新民将决定性的一票投给了当时看似过于大胆的方案——采用氢氧发动机，加快我国运载技术的发展。这个决定绝不是任新民的一时意气，而是完全来自实践的支持。早在1965年，任新民担任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所长之时，研究所就注重对氢氧发动机的研究论证，并在1971年取得了试验的初步成功，此后一直在进行相关的研究试验。在那次决定发动机的碰头会上，任新民声音不大但却底气十足的一番话让当时出席会议的人们至今记忆犹新：“氢氧发动机是今后航天技术发展所需要的，这个台阶迟早得上，我们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技术条件与设施设备条件，经过努力一定可以突破技术难关，中国完全有能力比攀甚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此时的大胆并不是冒进。”在真理面前，一个科学家的胆识使不善辞令的任新民力陈己见时往往能妙语连珠。他曾深有感触地说过：“搞工程技术工作的，即使是再有造诣的专家，不深入实际就会退化，会‘耳聋眼花’，三年不接触实际，就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了。”

这种来自实践的见识，还曾使任新民做出了另一项更大胆的举动。1985年下半年到1986年上半年，正是我国通信卫星工程从起步到深入发展的时期。国内有人主张：为配合我国改革日益加快的步伐，必须提高我国卫星广播通信的能力，不如购买国外的通信卫星以解燃眉之急。一时，买星的呼声很高。当时，全世界有170个国家和地区利用卫星通信，但只有少数几

个国家才有通信卫星。全世界 2500 多个民用卫星通道，只掌握在少数几个国家的手里。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经过 10 年的发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航天精神已经使中国航天取得了初步成效：中国的运载能力已经和世界在缩短着距离、卫星技术也在大踏步地赶上来，此时不是泄气之时。在许多场合中，任新民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的导弹与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在世界航天占有一席之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连他给老同学的信中也表达了这种想法：我们这些人有幸参加了导弹与航天这一事业，如果没有国家大的决策——要干导弹和卫星这件事，如果没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我们这些人即使学有所长，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于是在又一个关乎中国航天发展的关键时刻，就有了任新民那封被称为直言上谏的写给中央有关领导的信。他的有理有力有节的“心里话”，打动了当时的国家高层领导。随后，任新民不光用语言也在用自己的行动续写着那段“心里话”。在当年，就发射成功了我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随后的短短四年里，中国连续发射成功了四颗实用通信卫星，初步结束了我国通信广播事业租用外星的历史。

任新民一生呕心沥血的长征三号火箭，也为他带来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长征三号火箭的另一技术关键——纵向耦合振动问题的解决，使我国在大型运载火箭结构与液路系统动态特性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为我国大型运载火箭的研制积累了经验，并开创了我国相关的技术学科；1990 年 4 月，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了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在国际商业发射上零的突破。

其实，在任新民的航天生涯中，零的突破何止这一次，凭

借着一次次零的突破，任新民就像与他大半生相伴的火箭助推器一样将中国航天推向到一个个光辉的制高点，也正是这一次零的突破，成就了任新民这位中国航天的泰斗级人物。

放卫星的技术副部长

今天，关于 1970 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后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的晚上，任新民作为航天人的代表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时，周恩来总理向来宾介绍时所说的那句“这是我们放卫星的人”的故事已经被无数次引用，成为任新民也成为航天人力量的源泉之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运载火箭的历史是和任新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伴随着长征一号火箭的初啼到高轨道大力神长征三号乙火箭的发威，再到将飞船和中国人的飞天梦一起送上太空的长征二号 F 火箭的远征，任新民将他所有的心血都融入了中国航天。与此同时，虽然显赫的名声伴随而来，但是中国航天界也同时流传着任新民低调作风的不少故事。

虽然一直刻意避开各种光环，但是，当 1975 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国开始拨乱反正，中国航天事业在张爱萍的领导下进入恢复发展期时，任新民被推上了领导岗位，出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对于一向做事低调的任新民来说，副部长的位子似乎太过张扬，好在是分管科研和技术的官，任新民一如既往地做他的科研技术管理工作，在做宏观科研技术管理的同时，他的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不允许他高高在上。恰逢这一年正是全国各项事业开始信心重振、蓬勃向上的时候，任新民这一年有一大半的时间都不在家。他奔波于发射场、研究

单位、协作单位之间。任新民的认真和使命感，注定了这种忙碌一直伴随着他的航天生涯。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航天迎来三个六六大顺的吉日：7月26日、11月26日、12月16日，中国航天连续有三次成功的发射。对于刚刚调整步伐准备大踏步地前进的中国航天来说，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推动。这一年内的“三星高照”也是我国航天史上的一个飞跃。应该说当时担任副部长的任新民功不可没。但是他呢，面对记者，却是：“我没做什么，干我们这一行的，一个人的作用微不足道，如果没有全国各部门的大力协作，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共同奋斗，我们的导弹和航天事业就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这话可以看做是任新民对自己的一贯评价，也是他作风低调的真实写照。

这个时期，关乎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在马上就要到来的80年代的技术方向、技术途径和技术方案可行性等方面的探讨正在进行中。作为技术副部长，任新民有不少翔实的论述，并多次主持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展方向的讨论。

1978年的一天，任新民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会面之后，兴奋地告诉妻子，那个美国佬的话他都能听懂。闭塞了太久，只从资料和字典中接触美国，他对早先那个语言和习俗都已熟悉透了的美国已经渐感陌生，今天知道自己的耳朵、自己的大脑还能接纳这种语言，他像孩子一样忘情地笑了。在世界交往与发展中，语言作为重要的桥梁是多么不可少啊。

1979年这一年，作为七机部副部长的任新民与来我国访问的欧洲空间局代表团、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代表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代表团、日本宇航科学技术代表团的成员进行了友好的会见与交往。在与这些国际宇航界的专家、学者的交谈中，任新民对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受到世界同行的注目油然而生